

七〇年代美蘇經濟關係剖析

王承宗

由於世界局勢變化，以美蘇爲首的自由與共產陣營逐漸分化，從兩極的均衡改變爲多邊均勢，使持續二十餘年的東西冷戰表面融解；同時，在國內外情勢遷移之下，美蘇兩國的關係也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關島宣言，嗣並形成所謂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表明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轉變，即以和解（*detente*）代替對抗，尋求建立新的世界均勢。在此新政策下，美國政府主動地推展了一連串的外交活動，在自由世界造成了連續性的震撼。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森繼中國大陸之行後訪問莫斯科，與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簽訂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公開承認蘇聯戰略武力和美國同等（*parity*）。同月廿九日雙方簽署「美蘇關係基本原則」（*Basic Princip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A. and the U.S.S.R.*）^①，全文共十二款，其中表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存的信念，同意以協商、談判來解決爭端、防範核子戰爭發生的原則，並且載明兩國對其他問題具有之相同看法和從事解決問題的意願。基本原則第一款還特別強調：美國與蘇聯意識型態和社會制度之差異不是雙方正常關係發展的障礙，而關係發展係基於主權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內政和互惠諸原則。第七款說明美國和蘇聯視商業與經濟聯繫是強化相互關係之重要和必需的因素，並將積極促成此項聯繫的加強。雙方政府將協助兩國企業、組織之間的合作，締結適當的（包括長期性的）協定和契約。兩國將促進雙方海上與空中交通的改善。第八款則認爲，發展科學和技术領域的相互接觸與合作是適宜的、有益的。在適當場合，美蘇將商訂協定，以處理該方面的具體合作問題。

此後美蘇關係之發展大體以此基本原則爲依據，但是雙方在外交活動方面的對抗，並未因此停頓，仍然高潮迭起。整個七〇年代裏，美國國會在美蘇關係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國會的意向亦往往和白宮相左，這從美蘇經濟往來可以見其梗概。本文雖然祇是概要敘述雙方經濟關係，但亦可藉此窺見美蘇關係發展癥結之一二。

壹

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五日美蘇兩國代表在莫斯科發表設立美蘇貿易問題委員會的聯合公報，宣稱該委員會成立後將商討下列問

註① 消息報，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

題：(1)貿易協定，包括相互賦予對方關稅最惠國待遇；(2)相互提供信用貸款協定，例如由進出口銀行給予貸款；(3)相互從事商業活動與促進貿易發展之可能性；(4)關於貿易糾紛仲裁協定；(5)其他有關問題^②。同年七月底在莫斯科召開美蘇貿易問題委員會首次會議，兩國首席代表分別是美國商業部長彼得遜(P. Peterson)和蘇聯外貿部長帕托里切夫(N. Patolichev)。會中討論範圍除上述聯合公報所提及者外，還包括二次大戰戰時租借法案欠款清償問題、美國參加蘇聯工業計劃與提供信用貸款問題、海運及其他^③。同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八日該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行第二次會議，十八日雙方部長簽訂貿易協定、調整租借法案清償協定和相互提供信用貸款協定。各項協定主要內容是：規定兩國貿易額在三年內增加三倍；美蘇政府同意互予信用貸款，並在關稅方面給予最惠國待遇；蘇聯政府保證不在美國境內傾銷貨品；規定商業糾紛之仲裁辦法；兩國在華府和莫斯科互設貿易辦事處；原租借法案欠款一百一十億美元，約定蘇聯祇需償還七億二千二百萬美元，期限三十年^④。這次會議雖然頗有成就，但獲利最豐的當屬蘇聯。

翌年(七三年)，美國政府將貿易協定送交參院審議，即有若干議員提出修正案，其中最著名的是傑克遜—范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該案目的是想利用美蘇貿易協定作為制衡蘇聯的槓桿，亦即要蘇聯無限制地放寬移民(主要為蘇籍猶太人)出國，否則美國不能給予最惠國待遇。經過一年多的延宕，七四年十月間傑克遜參議員和季辛吉國務卿互換函件，表示諒解。傑克遜承諾迅速使參院通過美蘇貿易協定，使蘇聯獲得關稅最惠國待遇；季辛吉則表明，蘇聯業已向美國政府保證，對希望移民的蘇聯公民不採取懲罰行動，對行將出境的移民者，不施以無理和非法的阻難。傑克遜並在函件中聲稱，他與福特總統都認為蘇聯移民出國人數開始時最低標準應為每年六萬名^⑤。十二月參院終於通過了業經修正的貿易協定，惟其內容與七二年十月簽署之原協定大為不同，最主要的是在修正案中規定：美蘇貿易協定生效後十八個月內，美國方面如果認定蘇聯有迫害申請移民情事發生，即將取消所賦與之最惠國待遇；美國輸出入銀行給予蘇聯之信用貸款額在四年之內不得超過三億美元；此外亦禁止貸款供蘇聯用於天然氣之開發^⑥。這些條件對蘇聯而言是無法接受的「侮辱」，故在七五年元月正式通知美國政府，宣告廢棄七二年簽訂之美蘇貿易協定，連租借法案欠款也不還了。

不過雙方在七四年二月根據原貿易協定規定所設立的「美蘇貿易經濟理事會」(US-USSR Trade and Economic Council)

註② 消息報，一九七二年五月廿七日。

註③ 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註④ 消息報，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星島日報，同。

註⑤ 星島日報，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

註⑥ 星島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一日。

）並未撤消。這個新理事會由雙方政府財經首長和企業、組織人士組成，係半官方性質，負責推展兩國之間貿易業務和經濟活動。此後成爲美蘇經濟聯繫之重要橋樑，並在紐約、莫斯科設置辦事機構。

美蘇貿易經濟理事會除七四年二月、十月分別舉行成立大會及第二次大會外，嗣後每年舉行一次，每次會議均由蘇聯外貿部和美國財政部（和商業部）有關首長率團出席。而歷屆理事會都由蘇聯外貿部長和美國財政部長擔任名譽理事長，由蘇聯外貿部副部長和美國某大公司董事長擔任共同主席。美蘇雙方各有廿六名理事，以美方而言，有不少知名度甚高的公司董事長、總裁膺選爲理事，例如百事可樂公司、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國民商業機器公司（IBM Inc.）、通用電氣公司、奧錫登（Occidental）石油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大通銀行等^②。自七四年至七八年間連續舉行六次理事會議，對促進美蘇貿易與經濟合作有着重大的貢獻。就後三次會議而論，第四次會議時，有兩百五十名出席人員分別代表一百卅二家美國公司及其歐洲分公司^③。第五次會議時，有五百名與會者係美國各公司、銀行、組織領導人^④。第六次會議約有四百名美國商人飛赴莫斯科參加，美方準備了廿八項合作計劃，範圍包括能源、農業、食品工業、黑色冶金等。如果這些計劃全部實現，估計可以爲美國商人帶來一百億至二百億美元的生意^⑤。又在第五次、六次會期之間（七七年十二月—七八年十一月），理事會莫斯科辦事機構曾爲美國商人安排了一千二百次洽商業務的機會，有八

美蘇貿易經濟理事會會期表

屆次	會議時間	地點	美方政府代表	蘇方政府代表
第一次	一九七四年二月	華盛頓	財政部長蕭滋	外貿部長 帕托里切夫
第二次	一九七四年十月	莫斯科	財政部長西蒙	同右
第三次	一九七五年十月	華盛頓	同右	外貿部副部長 阿爾希默夫
第四次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莫斯科	同右	外貿部長 帕托里切夫
第五次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洛杉磯	財政部長布魯門索 商業部長克蕾普絲	同右
第六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莫斯科	同右	外貿部副部長 庫滋明

百多名美國公司代表訪問理事會紐約辦事處接洽實務。在理事會發起和協助下，有廿七個蘇聯工業、農業、科學技術、醫學和外貿組織代表團訪問美國；而美國公司一年間在莫斯科前後共舉行五十五場學術性講習會，有二千名蘇聯專家參加^⑥。

註② 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1974, N. 6 pp. 30—33.

註③ 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1977, N. 3, p. 11.

註④ 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1978, N. 3, pp. 13—17.

註⑤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8, 1978. 真理報·一九七九年一月廿九日。

註⑥ 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1979, pp. 25—26.

至於美蘇貿易問題委員會除七二年連續兩次會議後，約略每年舉行一次，是純粹的官方會議，有時和美蘇貿易經濟理事會同時、同地分別舉行。委員會討論之問題和理事會大致相同，所不同者乃兩個機構的性質，前者為官方人士組成，着眼於政策問題，後者為半官方組織，着重實務問題。

貳

貿易指數是衡量蘇聯與美國關係正常與否的最佳方式之一。在美蘇「和解」之前，雙方貿易額歷二十餘年均未能超過一億盧布，六九年之後即打破長期凍結狀態，該年貿易額升至一億六千萬盧布。七二年美蘇關係最和善時，其貿易總數比七一年多兩倍。因此在七二年十月，美蘇兩位部長於簽訂貿易協定時，基於事實發展需要，規定雙方貿易在三年內增加三倍。果然在七三年增加了一倍有餘。但在七四年，當美國國會審議貿易協定之際，貿易額即比前一年驟然削減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七五年蘇聯境內欠糧，曾從美國進口七百十四萬噸穀物，值八億四千三百萬盧布；七六年又向美國購入一千一百九十六萬噸穀物，值十一億八千五百萬盧布。蘇聯政府為求解決荒歉，不得不暫時擺出低姿態，使雙方貿易因穀物買賣而增漲。七七年穀物進口減少，貿易額跟着下降；七八年又大量輸入美國穀物，雙方貿易又有起色。該年貿易總額為十八億五千二百四十萬盧布（折合美元二十七億八千萬），其中蘇聯對美輸出二億五千三百萬盧布，自美輸入十五億九千九百萬盧布，蘇聯處逆差之勢（參表一）。但就美國來說，對

表一 蘇聯對美貿易（百萬盧布）

年 代	總 額	輸 出	輸 入
1978年	1852.4	253.1	1599.3
1977年	1527.9	271.6	1256.3
1976年	2205.5	198.7	2006.8
1975年	1599.5	137.4	1462.1
1974年	742.2	177.3	564.9
1973年	1161.0	137.8	1023.2
1972年	537.8	76.4	461.4
1971年	183.6	54.4	129.2
1970年	160.9	57.8	103.1
1969年	159.6	54.5	105.1
1968年	89.5	38.6	50.9
1966年	99.0	42.0	57.0
1960年	75.9	22.0	53.9
1955年	97.4	95.2	2.2

資料來源：蘇聯對外貿易年鑑匯編。

蘇貿易僅佔其外貿總額的百分之二一三而已，故彼此間之依存性並不大。蘇聯方面固然需要美國供應糧食和機器、設備，但亦非絕對必要。以雙方貿易內容看，蘇聯出口貨限於石油、原料、金屬製品、日用品；進口貨則以機器設備、運輸器材和穀物為主，特別是穀物輸入所佔比重頗大，但其輸入量須視蘇聯之實際需要而定，故使美蘇之間的貿易成長，缺乏穩定性（參表二）。

自美蘇「和解」後，雙方貿易如果能有一個正常發展的環境，自不難繼續成長，因兩國都是幅員廣大、人口衆多，極具潛力的市場；尤其是近年蘇聯與西方之貿易擴展迅速。一九七〇年蘇聯和西方工業國家貿易額佔外貿總額的二一·三%，計四十六億九千四百萬盧布；七八年增至二八%，計一百九十六億七千八百萬盧布。相

形之下，美國在蘇聯與西方貿易之中，所佔地位毫不顯著，這是由於美蘇之間的貿易障礙和困難所使然。

叁

美蘇兩國長久以來處於敵對態勢，二次大戰後之冷戰和蘇聯勢力的不斷擴張，使美國不能不懷有戒心。是以美蘇雙方對事務的看法和爭執的解釋，都有相當歧異。自七五年元月蘇聯宣告廢棄美蘇貿易協定後，蘇聯仍然透過美蘇貿易問題委員會、美蘇貿易經濟理事會和其他傳播媒介，要求美國給予關稅最惠國待遇、消除貿易障礙和經濟歧視。蘇聯所持立場係「美蘇貿易、經濟關係的發展成爲改善雙方關係的重要因素」；美國則堅持「發展美蘇貿易首先有賴於兩國之間一般情勢的改善」。易言之，蘇聯認爲祇有無條件獲得最惠國待遇、信用貸款、放寬出口管制，消除一切貿易障礙，才能談到雙方一般關係的改善。但是美國主張雙方一般關係改善之後，才可以討論貿易、經濟關係之改善。在第六次美蘇貿易經濟理事會召開前兩日，美蘇兩國官方代表趁便舉行第七次美蘇貿易問題委員會，由蘇聯副外貿部長庫滋明和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索、商業部長克蕾普絲領銜商談。雙方討論的還是老問題。在提到廿八項合作計劃時，蘇聯代表強調：「同美國公司實施合作計劃，祇有在兩國貿易正常化的情形下才是真實的。」此外，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接見美國代表團時亦再度確切表示：假如排除對蘇聯的立法歧視和利用貿易作爲政治壓迫之企圖，則美蘇經濟、貿易關係可以獲致更顯著廣泛的規模，並成爲改善雙方一般關係的重要因素^②。布魯所言是指七四年底美國國會通過的美蘇貿易協定修正案，將移民問題與貿易連結一起，和限制輸出入銀行的信貸數額。

移民問題在當時曾爲美國輿論注視之焦點。美國人士十分關心蘇聯境內少數民族，特別是猶太人的處境。一九六一年至七〇年的十年間，俄籍猶太人移民出國赴以色列定居者祇有一萬零三百三十名。當美蘇和解聲浪大起時，猶太人移民人數隨之大增：七一年爲一萬四千七百名，七二年增至三萬一千五百名，七三年再增至三萬三千名。這種情況自然鼓勵美國朝野人士，希望蘇聯放寬移民限制，對申請移民的俄籍猶太人不採取迫害、阻難行動，減低申請費用，廢除苛徵教育賠償費，因此才有傑克遜—范尼

表二 蘇聯對美貿易品類 (%)

	1975年	1976年
(對美輸出)		
機器、設備、運輸器材	2.94	1.52
石油、石油製品	24.40	34.91
礦砂	18.22	6.74
有色金屬、合金	7.46	8.22
日用品類	2.93	2.98
其他	43.96	44.55
合計	100.0%	100.0%
(自美輸入)		
機器、設備、運輸器材	31.07	30.94
化學製品	2.12	1.19
穀物	57.65	59.05
其他	9.16	8.82
合計	100.00%	100.0%

資料來源：1970年蘇聯外貿年鑑pp. 300-305.

克修正案的產生。但蘇聯對此表示不滿，使七四年移民人數下降至二萬零七百名；修正案獲得國會通過後，七五年移民人數直降為一萬三千三百名。七六年人數稍增，共一萬四千三百名，七七年一萬六千七百名，七八年恢復至七二年水平約三萬人獲准移民^⑬。猶太移民的增減反映了美蘇關係的起伏變化。七四年人數下減，可視為蘇聯對貿易協定法案的不滿，七八年人數復增，顯示美蘇關係有了新的轉機。今年六月間，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莫斯科記者威利斯(D. K. Willis)報導：蘇聯移民人數在七九年全年可能會超過五萬名。最近兩年來移民增加的原因主要係蘇聯盼望美國國會通過第二階段限武條約以及解除對蘇聯之關稅障礙，主動放寬移民數目，博取美國好感^⑭。

另一方面，美國在七五年初對蘇聯拒絕接受貿易協定修正案感到十分意外，而且蘇聯斷然減少猶太移民數目，加緊迫害國內歧異份子使修正案的原意完全落空。七八年八月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歐洲與中東小組舉行美蘇關係聽證會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雷渥德(R. H. Legvold)和喬治城(George town)大學教授克羅克(C. A. Crocker)都曾對傑克遜—范尼克修正案不表贊同，並建議適時予以廢除。不過也有美國學者仍然承認修正案是運用經濟關係以達到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是將其他難題聯結一起以便利談判的方法^⑮。修正案提議人傑克遜參議員和范尼克眾議員到後來也有不同的意見。傑克遜堅持認為「祇要囚犯仍在牢裏，祇要人民因請求移民遭到懲戒，祇要移民者爲了簽證必須多年等待，則蘇聯執行移民的努力是不夠的」。范尼克却認爲(七八年)蘇聯境內移民出國人數達到新的高峯，對眾議院的問題考慮是有實質幫助的^⑯。其實移民人數祇是恢復舊日水平，距離傑克遜和福特總統當年的瞭解還差一半，不應因爲移民增加而誤認爲蘇聯態度有了改變。自七五年以後，美蘇關係不是移民問題改善得了的，卡特的人權外交及其對蘇聯境內歧異份子的公開支持，蘇聯、古巴介入非洲之動亂，以及其他因素，都使得美蘇關係保持着時弛時張的狀態。

若僅就貿易經濟關係而言，雖然和蘇聯做生意並不容易，美國商人却一直懷有莫大幻想，多少亦獲得政府有力人士(特別是商業部)的支持。七八年九月美國德瑞射工業公司(Dresser Industries Inc.)擬售與蘇聯一套價值一億四千四百萬美元的石油鑽探設備，其中包括一部電子光波焊接器(electron beam welder)，價值不過百萬美元，因具有軍事用途並可增進蘇聯開發

註⑬ 星島日報，一九七四年十月廿一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7, 1979; The Japan Times, April, 4, 1979; 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1978,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Nine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p. 189.

註⑭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7, 1979.

註⑮ 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1978.

註⑯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8, 1979.

深井油藏的技術，致使總統的高級顧問與商業部之間發生爭執，結果還是商業部和該公司贏得了卡特的許可^⑧。蘇聯除需要美國農產品外，對電腦電子設備、石油化學、石油鑽探、重型汽車製造等具有高度技術和精密儀器的設備極為需求。蘇聯在購買時固然保證不將此類設備或產品移作軍事用途，但美國政府無法獲得有效監督和查驗，全憑美國商人的代表現場監督，其實際情形如何已引起有識之士的懷疑和憂慮。再次，與蘇聯交易是否有利可圖？短期言之不無好處；長期視之，可能使美國公司自身遭受損害。蘇聯對外貿易向來講究輸出入平衡，其對西方貿易却存在着相當可觀的逆差，七八年達廿二億八千萬盧布，約合美金卅三億元之多，迫使蘇聯必須出售黃金換取外幣予以支付；其中對美貿易逆差高達十三億四千六百萬盧布，約合美金十九億餘元，蘇聯因此要求美國增購蘇聯商品，以資挹注，但由於關稅障礙使蘇聯貨品處於不利的地位，加上俄製品質低劣，實在很難和其他國家競爭。蘇聯又希望美國輸出入銀行提供信用貸款，並以優惠條件吸引美國商人供應生產設備，而由蘇聯以產品按年償還。這種補償貿易對蘇聯最具利益，不但為蘇聯建立工業工廠，而且使其產品回銷西方市場，直接打擊西方國家的製造業者。蘇聯拉達牌（Rada）小汽車在北美展售，雖然無法打開更大的市場，但可由此看出蘇聯對外貿易的長期商業戰略。

當年韓戰爆發後，自由世界各國對共黨國家（包括中共地區）實施禁運或貿易管制，禁止戰略物資輸往敵國。惟隨着歲月遷移，管制漸漸鬆弛，西方國家之間對何種物資具有戰略價值的衡量尺度互不一致，若干國家且競相與共黨國家貿易往來。所以即使美國堅持貿易管制（七八年仍有七二〇項管制貨品）^⑨，嚴禁戰略物資輸出，或對蘇聯採行經濟制裁，其效果值得懷疑。去年七月蘇聯公開迫害國內歧異份子夏朗斯基（A. Shcharansky）^⑩等人，將之判刑陷獄，美國爲了對蘇聯此種侵犯人權惡行表示抗議，禁止出售電腦與塔斯社，可是蘇聯却從法國買進。由於西方國家缺乏合作，使對蘇聯制裁無效，它可照舊進口其迫切需要的物資。

就未來而論，蘇聯不會放棄對美貿易，縱使逆差加大或美國政府加強設限，莫斯科仍舊需要美國先進的工業設備、科學技術。貿易輸入是擴展蘇聯工業生產力和加速科技進步最直接的甬道。蘇聯估計^⑪，在五年之內雙方貿易總額將達二百億美元，平均每年爲四十億美元。蘇聯對美國商品的需求將繼續增加，而最迫切的是和美國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取得各項優惠待遇。

肆

美蘇科學技術交流亦是雙方經濟關係實質的表現。在七二年以前，科技方面的接觸大多是非官方的，主要係透過科學人員各

註⑧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 1, 1978; China News, Sep. 8, 1978.

註⑨ Robert C. Stuart, United States-Soviet Trade, Current History May/June, 1979, p. 206.

註⑩ Pravda, January 29, 1979.

自職業關係或出席科學會議的聯繫。一九五六年蘇聯發生小兒癩痺流行病時，促使蘇聯派遣一隊醫學專家前往美國，同時美國亦有一隊傳染病學家和微生物學家抵達蘇聯。這兩支隊伍的來往導致五八年美國國家科學院(U. 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和蘇聯科學院(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簽訂雙邊交換協定，每兩年續訂一次，互相交換研究人員²⁰；並且依據協定產生若干學術交換計劃，擴大領域至研究生、教師進修和資深研究人員的旅行訪問。七二年五月美蘇最高階層會談時，雙方簽訂了四個合作協定：(1)科學與技術協定，(2)保護環境資源協定，(3)太空探測協定，(4)醫療與公共衛生協定。隨後又陸續簽訂(5)原子能和平利用協定，(6)農業協定，(7)運輸協定，(8)世界海洋協定。七四年六月尼克森再度訪問莫斯科時，與布里滋涅夫續簽(9)能源研究協定，(10)住宅與其他建築協定，(11)心臟病研究和人工心臟改良發展協定。總計自七二年至七四年美蘇雙方共簽訂了十一個有關科學技術合作與研究發展的協定，且均屬於雙方政府機構與機構(Agency to Agency)之間的合作。附屬於這些協定的計劃(projects)達三百項之多。其活動型式有：互相訪問對方的研究機構、學術演講、科學人員交換和資料、情報交換、共同研究等。自七二年以來，雙方科學人員互訪人數大增，以短期個別人員訪問為例，七〇年蘇聯科學家個別赴美國作短期參觀訪問者祇有一百十三名，七一年美國科學家個別短期訪蘇者九十八名；七二年前者增至二百四十六名，後者二百六十二名；七六年，前者八百七十六名，後者九百七十三名；七七年，分別是六百六十八名和七百七十二名²¹。

在七七年全年中，美蘇雙方共有六十八名學者作九個月以上的長期訪問；發表六十五份共同著作，一百廿五份美方和六十三份蘇方的研究報告；都是依據協定合作產生的。七七年短期訪問人員當中，以在保護環境資源協定項下交換的人數最多，雙方合計二百九十九名；其次是科學技術協定共二百卅八名；而公共衛生和心臟研究兩個協定合共二百零九名；能源研究協定一百五十一名。在上述著作和報告份數佔最多的是科學和技術協定項下的，共八十三份。

美國朝野對美蘇科技合作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和評價。助理國務卿皮克林(Thomas R. Pickering)於七八年十月在給眾議院國內與國際科學計劃、分析暨合作小組的報告書中指出：「我們已證明美國和蘇聯本着平等互惠能够合作，並對人類的需要結出科技的果實。兩國之間在科學方面的訪問比起簽訂協定之前已增加十倍。我們對蘇聯科學領導人與官員有更深入廣泛的接觸，對蘇聯官僚政治和決策程序，有更好的瞭解。在實施這些協定時給了我們進入閉鎖的蘇聯社會一條寬濶的通道。」皮克林認為藉着協定實施過程可使美國政府更加認識蘇聯和接觸其國內科學界人士，或許可以使自由之風吹進蘇聯科學界，影響他們的思想行為。不過美國學者就不這樣想了。著名的斯拉夫學教授比爾尼斯(Robert F. Byrnes)認為：蘇聯利用文化交流獲得設備、技術和美國大學實驗室的發明，以縮短蘇聯與西方科學技術差距，正如同它利用貿易獲取工業資料並將西方技術注入蘇聯經濟一樣

註⑳ Survey: a journal of East & West studies, Autumn 1975, V. 21, N. 4, pp. 52-59.

註㉑ United States-Soviet Relations, 1978; 註㉒⑳。

。蘇聯在科學技術知識方面已得到顯著的增長，從基本的關於小兒痲痺症知識、計量經濟學和企業管理制度到電子、石油鑽探、生物化學製造等^㉔。而且蘇聯參與交換研究之人員或派赴美國參觀訪問的隊伍絕大多數是科技專家，在美國各地搜羅科學情報。

至於親身參與美蘇合作的美國科學界對蘇聯的印象也不好，到過蘇聯的美國學者回國後比往訪之前對蘇聯的批評更多。七五年有一篇對科學技術、保護環境資源和太空探測三個合作協定實施結果的報告指出：美國與蘇聯情報的交換是有限的，並且對美國幾無利益可言。在任何時候蘇聯都極不願意提供情報給美國。此外，美國科學家對蘇聯政府迫害歧異份子及其對科學人員的約束監視，也感到憤慨。七八年二千四百名美國科學家聯名抗議蘇聯逮捕夏朗斯基。此事到七九年四月廿三日真理報刊載以蘇聯科學院兩位副院長和三位院士共同署名的文章中，竟然誣指美國科學家簽名抗議之舉是受到壓力的，因而引起美國五位得過諾貝爾獎的科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表示美國科學家簽名抗議者決未受到任何方面的壓力；同時警告蘇聯，將有愈來愈多的美國人退出其所參與的交換或其他合作工作^㉕。事實亦復如此，不少美國科學家已拒絕參加美蘇科技合作計劃。這對美蘇未來合作遠景而言是很不樂觀的。

伍

美蘇經濟關係原屬經緯萬端，其發展雖為近十年間事，但已波濤起伏，枝節橫生。美國素為反共堡壘，其反蘇反共的立場、原則是不會有所變動的；爲了謀求世界和平，爭取人類福祉，美國亦真心盼望蘇聯能放棄成見和平共處。唯事實表現是，蘇聯作為極權國家的本質若不改變，蘇聯人民若無真正的自由民主，則與之貿易往來，或與之合作研究，無異是齎糧資盜，與虎謀皮。再者，蘇聯每將得自美國和西方國家之科技文明，不用之於民生福祉，而用之於軍事殺伐，則更爲助紂爲虐。爲今之計，美國應繼續堅持反共反蘇的大原則，支持蘇聯境內反共人士，聯合自由世界反共力量，共同阻絕蘇聯的擴張侵略野心。

註^㉔ Survey: a journal of East & West studies, Summer/Autumn, 1976, V. 22, N.3/4, pp.26-38.

註^㉕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 28, 1979.